

QI · JUN · ZI · ZHI · SI · QI · JUN · ZI

七君子之死

● 塑像·草地·过去——一九三六年以及那个深秋

● 七人与救国会的成立 ● 来自南京的压制

● 瓦窑堡的特使 ● 到南京去请愿

● 国人难忘九·一八 ● 救国会与鲁迅葬礼

● 不是凯歌却依然要高唱

● 遥远的夏夜里，寻找他们的轨迹

● 爱国者的人格 ● 外来文化和新爱国主义

● 五四大潮中的健儿

● 警钟·国难·抗战——从济南惨案到七七事变

● 警钟再次敲响 ● 九·一八啊，九·一八

● 女牢中的史良大律师 ● 拒绝反省

● 开庭审判 ● 爱国入狱运动

● 在七七事变的炮声中走出牢房



潘大明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七君子之
死

潘大明 著

七君子之死

QI · JUN · ZI · ZHI · SI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 01 号

七君子之死

潘大明 著

责任编辑 夏晓远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省孟津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242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7-215-03017-2/K·452

定价:8.65 元

目 录

塑像·草地·过去——1936年以及那个深秋……

* 1936年的中日两国	2	* 七人与救国会的成立	9
* 来自南京的压制	14	* 瓦窑堡的特使	20
* 到南京去请愿	24	* 国人难忘九一八	27
* 救国会与鲁迅葬礼	29	* 七人被捕的导火线	42
* 七人与同一个深夜的故事	46	* 第二次被捕	56
* 不是凯歌却依然要高唱	65	* 七君子事件与1936年 中国社会	72

遥远的夏夜里,寻找他们的轨迹

* 爱国主义的萌生	80	* 爱国者的人格	85
* 外来文化和新爱国主义	90	* 求实精神与七人爱国特征	95
* 五四大潮中的健儿	97	* 五四对于七人的意义	103

警钟·国难·抗战——从济南惨案到七七事变

* 警钟再次敲响	133	* 九一八·九一八	141
* 囚禁看守所	156	* 禁止探视	161
* 女牢中的史良大律师	162	* 拒绝反省	164
* 开庭审判	165	* 爱国入狱运动	175
* 在七七事变炮声中迈出牢房	180		

瞬间的相聚,总有道别。永恒的是期待一个新中国

* 从武汉到重庆	185	* 孤身在皖北	190
----------	-----	---------	-----

DM177/06

* 在陪都重庆	194	* 转辗在红色根据地	199
* 威逼·利诱·出走	202	* 建立在苏北的丰碑	210
* 韬奋之死	221	* 为民主而战	234
* 李公朴最后的时刻	240	* 从上海到香港	251
* 相聚在五星红旗下	258		

共和国·风浪·生命的白帆消逝

* 倾注在共和国事业中的热情	271	* 五人与民主党派	276
* 不灭的求实精神	282	* 教授的遭遇	286
* 一个部长的命运	292	* 对右派的回击	297
* 举杯声中与世长辞	302	* 乌云中流逝的生命	309
* 章乃器,大写的人生	314	* “沙僧”之死	325
* 史良最后的历程	329		

塑像·草地·过去——

1936年以及那个深秋……

我默默地离开塑像。据说塑像原形的爱女见到父亲的塑像时异常激动，禁不住热泪盈眶。塑像美髯飘拂，双唇紧抿，显露出执著、坚毅，一双眼睛充满慈祥和温情，透射出对民族未来的期望。我无法抹去那双铜铸的眼睛中期待的渴求和隐约飘动着的丝缕焦虑。

塑像下的秋日草坪，依然很绿，绿得深沉且顽强；草坪上已绽出几丝铁锈色的草叶，预报着冬的信息。我漫步在草毡上，贪婪地吮吸着秋日特有的清新，我感到这清新正孕育着冬天过后的一个崭新的景象。

人生赋予秋日的意义大相径庭，伤感者称它为悲秋，仿佛秋日的一切都笼罩在凄凉之中，也好像冬日过后不会迎来春天；垂暮者把秋与死亡相连，落叶中觉得死神的催促，一片金黄令他胆寒。

多少首秋歌，引来悲凉；多少个秋日，激起诗人的忧伤。他们始终没有感知秋日独特的旋律，和那如金属般撞击的铿锵。在那强劲的旋律中，仿佛有一个巨人走来，踩过金色的落叶，碾碎片片悲凉，召唤人们迎接挑战，战胜严寒的无情。秋，强者的诗，巨人的旋律，宛如一双青筋隆起的大手在黑白相间的琴键上敲击出撼人心肺的

音符。

突然，一个身穿火红色衣服的女孩闯入草坪，打破了我对秋的遐思。女孩迅跑追逐一个火红色的气球，于是，一片深沉的绿色中涌动一簇火焰。她执著地追逐自己的一份心爱，没去斜视咫尺间的塑像，径直绕过塑像，消失了踪影。我想再续上自己的思路，可惜有点难为了自己。

不一会，女孩回到草坪，手中攥着气球线，一脸胜利。我问“你为什么不注意塑像？”女孩大约觉得我的提问十分古怪，反问道：“我为什么一定去注意它呢？我在追气球。”女孩洒脱地远去，带她的气球消失在草坪上。

我凝望着女孩渐去的火红色身影，不禁忆起那塑像人物的名字——沈钧儒。他在年富力强的中年时，曾针对儿童说过这样的话：他们是祖国未来建立民主社会强有力的童子军。儿童不是家庭的私有财产，属于社会，只是家庭的一个过客，他们肩负着铲除旧制度、一切恶习的重任，无异是国内唯一的希望。

相去数十年的声音，始终在我耳畔回荡。袅袅荡荡，寄托着对于来者的厚望。

也许有的人会说记忆在时间磨损下总会变得依稀朦胧，甚至连忘却也属于正常范围，何况，一个离去今天遥远的对人们已相当陌生的声音，即使它被留在史册上，没有人翻动似乎也无怪。

然而，为了明天的辉煌，人们不该忘却他们那一代的奋斗精神和留在史册上的业绩，记住他们生活的苦难岁月和殷切期望。

1936 年的中日两国

腥风血雨的 1936 年，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一年。一位深知内幕

的经历者写道：它是中国现代社会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

中国工农红军在来自韶山冲的儿子率领下，已完成了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征，顺利进入仅存的苏维埃边区，重申长征途中发表的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公开表示愿与政敌蒋介石携手，共同抗击民族的敌人。红军东渡黄河，准备开赴河北前线，实现自己的诺言；同时，秘密派出使者与不共戴天的国民党进行高层谈判，试图扣响两党合作的大门。毛泽东以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博大的胸怀指出，南京是民族运动中一支重要力量，我们的方针过去是愿意谈判，现在仍继续这个方针。秘密特使重回到上海，和陈立夫会谈。两党高层次会谈在继续，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还积极与国民党军界实力派接触，争取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刘湘、张学良、杨虎城等支持中共的抗日主张。经过努力终于实现了西北大联合。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和红军达成默契；西北由两军对峙，转为两军停止敌对状态，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

历史机遇与挑战同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两个政党重新合作有了必要的基础，挽救民族危亡不再是一种虚幻，中华民族出现了复兴的希望。

蒋介石对于西安事变预料不及，他不会想到自己拜把子、换帖儿的小兄弟会出兵谏一招，使他无可奈何地同意结束国内战争。

对于联合红军抗战，他不是没有想过。早在上年末，他就派出心腹陈立夫秘密赴苏联试探。1936年1月22日国民党南京政府向苏驻华大使表示：“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

蒋介石一面伸出触角进行政治试探，一面仍调集大军继续围

剿红军。爱穿黑色大氅的国民党军事委员长从骨子里惧怕已被赶到陕北的那群“赤匪”，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他试图一举消灭以马列主义为自己灵魂的政党和军队，以解决心腹大患。他下洛阳飞西安，亲临前线督战。西安兵谏，迫使他接受昔日部下周恩来的意见，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担保内战不再发生，委员长认为签字画押有损体面，发誓以人格担保。

1936年末的兵谏事件，不仅对1936年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使这一年变得重要起来，而且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未来前途。

1936年对于中华民族的敌人，海波涌动中的岛国——日本，也同样重要。

昭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一群少壮派将校率领1500名官兵袭击了内阁，成功地杀死了内阁大臣藏相……瓦解了一个主张缓步吞食中国的温和政府，加速岛国的法西斯化进程。臭名昭著的国家主义者广田弘毅被召回国，组织内阁。内阁成员的人选需经军部画圈，军人出任军部大臣，强化军部对政治的支配，严格控制内阁。广田内阁的政策根据军部要求的所谓“庶政一新”、“广义国防”来制订，完成了军政合一体制的建立。八月，首、外、藏、陆、海五相会议，决定“国策大纲”，以“稳步地向海外扩张，谋皇道精神的实现”，“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为根本国策。十一月日本与德国、德国与意大利结成联盟，分别展开对邻国的侵略。1936年的日本大体上已经完成了下一年对中国实行全面侵略的战略准备。

1936年中日关系到了剑拔弩张的紧张程度。华北出现了由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大小汉奸组成的“自治政府”、“政务委员会”，日本试图通过“自治”，变华北为满洲国之类的殖民地；内蒙一些王公在他们的指使下，点燃绥远战火，中华儿女为了保持祖国领土的完

整，不惜血洒百灵庙。1936年中日冲突，是一场没有防线的战斗，日本散布在中国土地上的租界，成了弹药库，到处出现了日人挑起的事端。据史书记载，日本军警、侨民在北平、上海、天津、汉口、太原、汕头制造了14起有影响的事件。

1936年中国上空弥漫着火药味，南京政府却幻想着通过外交途径驱散呛人的味道，不惜代价平息中日一切争端。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声言的“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之最大努力”，成了南京政府1936年对日的主要政策。

上年末，张群出任外交部长的第二天，匆匆忙忙接见中外记者，宣称，“中国政府对于任何外国——尤其对于关系最深切之国家——仍当竭诚相处，谋国际关系之调整与国际局面之更新。”

南京政府十分想调整对日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满足日方对中国的领地、主权的要求。可是，日方并不因此领中国的情，1936年1月21日抛出中国放弃以夷制夷政策、尊重满洲国的存在、中日共同解决北方防赤化问题的“对华三原则”，谎称南京政府已经赞同。南京政府乱了方寸，赶忙出面否定，一下子使调整关系的预想成了泡影。日方撤回素来主张侵华政策应缓进的有吉大使，南京政府慌了神，低三下四地马上表白中方已原则接受了日本的“三原则”。

日本新任驻华大使有田八郎2月26日抵上海，随后北上南京，与张群会谈。有田的职责是使“对华三原则”具体化。该大使擅长辞令，攻势凌厉，让张群招架不住。张群使出拖延术，推三挡四，含糊其词，既怕拒绝了日本要求引来事端，又怕满足日本条件国人为此愤慨，出现动乱局面。会谈毫无具体结果，耗了张群不少黄汗和唾沫。

日方无意留恋谈判桌，大量增兵华北，扩大天津屯军的范围。

南京政府无力制止，听任日军在华北横行。日本军事上不费一兵一卒进行扩大，经济上利用日朝浪人在华北大肆进行走私，直接影响南京政府的财政收入，一个月里损失关税 800 万元之巨。中方照例提出抗议，抗议声在日方的冷处理中没见一分效果。

软弱的南京政府再次向日方表示“诚意”，外交部长张群公开说：“中国之于邻国，愿以最大之努力，辑睦邦交，乃势所必然。而中日两国间以同种族同文化之关系，亟应互助提携，共谋发展，更不待言。”拉亲近、攀关系，企图阻挡日本侵华的步伐。

日本“二二六”政变后，有田大使奉命出任外相一职，擢升天津总领事川越为驻华大使。川越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中日经济提携的友好使者，正式上任前屡次向新闻界表白自己。时隔不足一月，他顾不上经济提携的幌子，迫不及待地视察华北，与日驻屯军首脑密谋如何落实在东京召开的“五相”会议精神。

谈判假惺惺地继续进行着，一来可以造成假象欺骗国际舆论，二来给南京政府一线希望。同时，用战争、挑事端的手法，逼迫南京政府就范。南京政府明知这是日人的诡计，但迫于国内舆论的需要，只好硬着头皮同日方进行毫无价值的对话，以至争端四起，关系极度僵化时，还低三下四地缓和气氛，满足日方要求。日人常以谈判“只有破裂”、“增派军队”相要挟，弄得张群胆颤心惊，坐卧不安。张群 92 岁安居台湾时，还不能忘记这时期与日大使的谈判，“川越茂任大使时，经历八次会谈，对方紧锣密鼓，凌逼万端，在漫长的时日与不断的谈判中，我既不能接受对方的要求，同样也不能让谈判破裂，目的在争取我们备战的时间。在这一阶段中，可说是千辛万苦，心力交瘁。”

南京政府对外软弱无能，对内继续进行内战，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气焰，客观上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步骤的实现。

内忧外患，国家处在岌岌可危的状态中，民族处在随时遭外敌蹂躏的境地。家破国亡，朝夕之间将变成现实。

许多有识之士在1936年到来之前，就预见到它将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头。1933年12月12日《北京晨报》教育版头条刊登了《北大1936年研究会大纲》，指出：1936年在中国前途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决定中国存亡。中国青年要及时作好知识和技术上的准备，迎接这一年的到来。拟草这份大纲的是北大的一位穷学生，他不能安心神游在柏拉图、苏格拉底古典哲学流派中，国难当头，读书、文化救国如同白天上的云彩一样好看却过于缥缈。后来这位学生成了中国现代杰出的新闻记者，他的名字叫范长江。

一位未来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一九三六年》的后记中，忧心忡忡地写道：“现在是一九三四年的秋天；中国的江南还刚刚是桂子飘香的好时候，然而我们一想到将要来临的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不禁慄慄危汗！我们相信这一次人类空前的巨劫，这一次人类的大残杀确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人们在诚惶诚恐中迎来了1936年的元旦钟声，未来的365个日子里，不知哪一夜醒来自己兴许就成了亡国奴。这一年11月，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军阀段祺瑞客死上海法租界，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曾拱手把祖国主权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执政者，临终的遗言竟是“国事如此，全国上下逐应一心一德，团结救亡御侮”。

国家危难，稍有良知的中国人岂能置故土存亡而不顾，无动于衷？

人民期待内部的团结，一致抗日御侮的一天到来。风起云涌的民间救国运动此起彼伏，在上海及全国各主要城市蓬勃发展。他们徒手向尚处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指导下的南京政府发起了进攻。

1936年,对于中华民族,危机与希望同在:和衷共济并肩战斗,敌人必然灭亡,自己将会在战火中创造历史上崭新的一页,开辟一条民族的希望之途;否则古国弱不堪击,沦为殖民地已不是什么恐吓或警钟,而是一种必然的归宿。古老民族终于经受住了考验,选择了摆脱危机的新生之路,在以后的岁月里民族奏响团结一致,枪口朝着共同敌人发射出正义子弹的强劲旋律。朋友,不该忘却1936年,以及灾难深重的民族史册的一页。历史用它如椽的大笔写道,忘却苦难过去的民族不会成熟,未来的辉煌不可能属于他们。

半个多世纪后的金叶飘坠的秋季里,一缕霞色透过窗棂,折射在《辞海》第13页上,如蝉翼般透薄的纸页闪烁出一束神圣的光泽。

13页上密密麻麻印着一段文字,记载了1936年发生的一桩著名的事件。

【七君子事件】1936年5月,沈钧儒、邹韬奋等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红军议和,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国民党政府坚持卖国内战政策,于11月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等七人,时称“七君子事件”。这一事件引起全国人民反对,各地展开了营救活动,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沈钧儒等被释放。

条目扼要。历史的全貌与条目之间,前者丰富且完整,远远超过名词的注脚。浩荡历史大潮送走无数的细节,留下只字片语的梗概或框架,提示人们不该忘记过去。回首仔细寻找他们在历史流程

中留下的足迹，人们会由衷地感慨。细嚼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人们会懂得过去，认识大于提示千倍万倍的他们……

端详霞色中的《辞海》，我陷入了沉思。七君子现象出现在1936年绝非历史的偶然，本质上无法摆脱历史发展过程中内在规律的支配，所谓偶然恰表现出不易一目了然的必然联系。七人走过各自漫长的人生路，于同时同地同案遭逮捕，凛然登上囚车，反映了他们思想实质的一致和实践目的的同一性。1936年11月——1937年8月，七人短暂的相聚，呈现在史册上无疑是一种显形的集合，体现出他们的共同精神和追求，而在这一时期之前的相当长的孕育过程，七人始终处在一种隐性的集合状态中。同样，显形集合状态过后，他们又回到了隐性的集合体里。无法否认的是隐性状态的集合体中七人的思想精神本质、行为所需达到的目的依然具有同一性，纷繁的现象掩遮不住内在的联系。

理性的思考，不免过于抽象，似乎不好理解。我脑海里屡次闪动着1936年11月23日凌晨，一个十分具体的时间概念，仿佛听到黑暗中回荡凄厉的警笛，看到七人从容登上囚车的背影。

七人与救国会的成立

蒋介石与他的南京政府，处在历史的重要关头，表现出动摇和矛盾。它一面与中国共产党人暗中接触，试图找到解决两党争端的途径；一面调兵遣将对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同时又与民族的敌人聚在谈判桌边作无休止的交涉，发表空洞的外交声明和抗议，实质上放纵日本的侵略行为，随它任意践踏祖国的主权。南京政府处在动摇不决的状态中，何去何从关系到祖国的危亡、民族的前途。

人民显示出巨大的力量，他们认识到中国的危机并非“国难严重”四个字所能概括，已经到了亡国的边沿。全国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同胞，有必要团结起来，促进全国各党各派实力分子，停止内战，一致联合抗日救亡。他们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人民自己假使不先联合起来，便无法促进各党各派的合作”。

1936年5月29日，上海博物院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挤满着人，谈论的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救国。

在这里将举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50余位代表来自18个省市，计代表60余个救国团体。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人们的激情不时打破秘密举行会议的规定，声浪冲出屋子。会上通过了《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两个重要文件：建议各党各派立刻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全教会愿以全部力量保证各党各派对于共同抗敌纲领的忠实履行，制裁任何党派违背共同抗敌纲领的行为。

大会声明全教会现阶段的主要任务，那就是促成全国各实力派合作抗敌，没有任何的政治野心，没有争夺政权的企图，组织全国救亡只不过是尽一份人民的天职，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不帮助任何党派去攻击任何党派，保持高度的超然性和独立性，维护民族的共同利益。

会议举行了两天，会上选出沈钧儒等15人为常务委员，邹韬奋在未出席的情况下，当选为执行委员。

会后，全教会在各报上发表了措词激烈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时局紧急通电》。

各报转全国同胞公鉴：

四年九个月以来，日本既夺我吉黑，复攫我热河，又进窥我冀察，近更增兵华北，保护走私。按其野心，势非灭亡我中华民国，臣服我中华民族不止。我当局虽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但我退一寸，敌进一尺，我之土地有限，而敌之贪欲无穷，以仅仅四年余之时间，不战而丧失一百六十余万方里之土地，五千余万人民，中外古今，实所仅见。若不翻然变计，不分党派，不分阶层，举全国之力，以与敌人一战，则敌势蔓延，病入膏肓，国亡无日矣！今有报载西南将领，已揭起抗日之旗帜，实行出兵北上。时机迫切，间不容发。我中央当局，亟宜立示决心，领导于上；全国民众，自应群起响应，督促于下。务使全国兵力，一致向外，抗日战争，立即展开，恢复我已失之河山，拯救我被压迫之同胞……

全国各界救国会的成立得到社会著名人士宋庆龄、马相伯、何香凝的支持，他们被选为全救会执行委员；一些共产党人也参加了全救会的工作。

全国民间抗日组织在 1936 年中期出现，绝非偶然，它是民族矛盾不断尖锐，祖国危亡即在朝夕的必然产物。此时各民间抗日团体如雨后天春笋般不断涌现，解放先锋队、救国协进会、抗日救国会等难以统计，但均处于各自为战的局面，缺乏统一的行动纲领和共同的步骤；因此组成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势在必行。

全国救国会在上海诞生，也非偶然。上海虽不处于当时抗日前线，但由于它是旧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集聚着大量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们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能勇于担负历史的重任，自觉地投身到抵抗外来侵略的洪流中，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民众公认的领

袖。同时，在上海他们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上海人民亲历过一二八淞沪战争，对日寇的暴行有着切肤的感受，一旦抗日救亡领袖与群众相结合，必然形成一股强大主张抗日的社会力量。

1935年末，上海先后出现了文化界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1936年初，又出现了各大学教授救国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在此基础上，上海于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四周年的日子里，各方面救亡团体代表和爱国人士在上海总商会礼堂宣布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并推选沈钧儒为联合会主席，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及其他一些人为执行委员，统一领导整个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上海民众自发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成了全国救国会在上海诞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救国会的发展，经历了由小到大的过程。它的雏型是由十一二个观点一致，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举办的叙餐会。

救国会创始人之一章乃器在31年后的隆冬时节里回忆道：“救国会是从一个十人小组开始的，现在记得起姓名的大概是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周新民和我。小组的推动者大概是周新民，而公开召集的是沈老。当时所用的是叙餐会形式，每一二星期叙会一次，上次决定下次会的日期和地点。”

叙餐会——谈和吃的结合，一群爱国文化人相聚，共同的话题自然是国内外形势，日本的霸道、野蛮，祖国的处境，人民的疾苦，统治者的腐朽。边吃边聊，吃完聊完各自掏腰包付帐，绝无吃公款现象。

吃与聊总不免流之空泛，国难当头清谈无济于事，没有固定组织把大家联系起来，形成不了社会力量。组织起来成了叙餐人们的一大心愿。1935年11月16日，邹韬奋在他主编的《大众生活》上，公开了这一心愿，“我们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全民族争生存的问题。